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 R. K. I. 奎斯特德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 R. K. I. 奎斯特德著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陈霞飞
陈泽宪
校

八
〇
六
〇
年
七
月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by *R. K. I. Quested*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8

1857-1860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R. K. I. 奎斯特德著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 1/4, 印张 227 千字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55 定价: 0.9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绪言附记	17
第一章 1792 年至 1857 年俄中关系的背景	19
第二章 1857 年 1 月至 1858 年 7 月: 普提雅廷的使命 与《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	77
第三章 1858 年 7 月至 1859 年 6 月: 彼罗夫斯基的使 命,《天津条约》的互换,与《瑷珲条约》之被中国 废除	160
第四章 1859 年 6 月至 1861 年 1 月: 伊格纳提耶夫的 使命与《北京条约》	197
结 论	271
书 目	281
人地名对照表	289
译后记	298

绪 言

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它过去的历史，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的现状。虽然对于两国本身，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只是些无关大局的、细微末节的事务，在世界政权的中心它也只引起轻微的震动。可是，近年来，这种关系却涌入了全球大事的主流之中，就使得对这一内容非常迷人的题目作一个回顾，甚至追溯到较远年代，增添了重要性。

然而，中俄关系的历史，迄今尚未得到它所应得的充分研究。目前虽然业已存在一定数量关于俄中关系的一般论述，其中多数是中文的，但是，引用全部现存可资运用的资料而撰写的学术性通史仍未出现。同时，用欧洲语言对特定时期所作的详细专题论著也比较少，用远东语言写的就更加罕见了。

关于下至 1792 年的早期历史，已经由历史学家们使用俄国方面的资料，作过相当的研究。可是，在使用中国资料方面，尽管现在已有塞比斯神甫对尼布楚条约的出色研究，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巴德利编：《俄国、蒙古、中国》和加恩著：《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这两部极有价值的书已对 1617—1725 年阶段作了概括。但是，这两部书都是只用俄国档案资料为基础。书中那怕就象雅克萨战斗与尼布楚谈判，从俄国方面来说，事情也不是都讲得清清楚楚的^①。班蒂什-卡缅斯基所编：《1617—1792 年俄中外交》^{viii}

① 雅可夫列娃著：《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 年莫斯科版，是从俄国方面研究尼布楚条约的著作；另外，文森特·陈在 1967 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十七世纪的新书。

资料汇编》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它差不多把那些年两国间外交函件全部汇集到一起了。库尔茨教授 1929 年在哈尔科夫大学出版了有关此一时期饶有兴味的著作：《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这是一部讲俄国政府垄断它对中国贸易的书，只是它们差不多也全是以俄国材料为主。十九世纪还有一本以这一时期为主的特鲁塞维奇写的《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它把库尔茨书中没有提到的资料搜集进去了。可是，它不如上面提及的那些书那么有用。

关于 1792 年以后俄中关系历史的著作就出版得更少。1857 年柯尔萨克著的《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是一部下至十九世纪中叶，涉及全部俄中贸易的历史书，而苏联作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从开始讲到 1955 年，算是一本当年出版的新书，而就政治历史而论，关于这一时期，还未曾有过一本能象论述早期那样详尽的书。1919 年胡世泽在巴黎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近代俄中关系的条约根据》，试图在没有中文材料而俄国材料又很少的情况下，把 1850—1881 年间的事，加以概括论述。另外，还有 1949 年 P.I. 卡巴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提出的题为《阿穆尔^①问题及其解决》的博士论文，但只有它的第一部分陈列在列宁图书馆供公众使用，其内容论述穆拉维约夫在国内经历的各个方面，和俄国人在这地区早期的开发活动。它的第二部分，讲到穆拉维约夫时代俄中关系的却不出借（后面将进一步涉及）。1959 年卡巴诺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②出版了一本叫《阿穆尔问题》的书。把他的博士论文的第一、二两部分作了压缩。只是，内容一经压缩，大家所不知道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ix 坂野正高与马克·曼考尔依据中国档案把伊格纳提耶夫使团的部分有趣的材料加以印行。对 1881 年伊犁事件有一篇短文登在 1936 年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它用的仅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即海兰泡。——译者

仅是中文和英文资料。左舜生在《中国近百年史资料》^①卷I中也收有伊犁谈判的资料，纳罗奇尼次基所著：《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是从俄文资料中对1861—1895年代所作的有份量的概述。最后，罗曼诺夫题为《俄国在满洲》的书，研究了1895—1905年俄国的对华政策有头等的重要性。可惜，它仅仅依据财政部的档案，而未及于俄国其他任何档案，更没有别国的任何资料。

1905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代迄今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涉足。间或有此种著作问世，虽然质量很高，但大多不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惟一特殊的例外，那就是台湾将1917—1920年俄中边界关系的档案印行了。它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可供进行学术研究。

日本人也进行了许多俄中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关于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从政治上闭关自守中走出来之后出现的事件。但是，除坂野正高所著：《中国和西方》中的有关各章之外，据现在所知，都未译成其他文字，而且显然没有一本书曾对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提供过详细的论述。^②

俄中外交关系史中的几个空白阶段当中，再没有比1857—1860年间俄国攫取沿阿穆尔河和滨海各省时期更为引人兴趣和文献更丰富的了。尽管有过坂野正高和曼考尔合写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一阶段迄今仍然是未经全面和详细地考察过的。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毋需加以强调的。因为，这一片辽阔土地落入俄国之手，肯定是远东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之一。同时，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是中国在它不久以前的衰弱时期所受创伤

① 此书正在付印时，徐中约研究伊犁事件的一本新作刚才问世，同时，沙俄对外政策的一本新的文件汇编正在莫斯科发行。

② 可惜我不懂日文，无法亲自阅读它。

中最为持久的。外国历次入侵的创疼,即使是上次的对日战争,都已经愈合了。数目浩大的赔款也不过是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大海多添几吨水罢了。而且这种落后状态她也正在克服之中。台湾归根结底也是在中国人民手里。伊犁和外蒙古价值比较次要,其他的边缘地方都已完全收复了。可是,难以想像,丢失给俄国的富饶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土地,除非经过重大的变乱,它怎能改变过来!对俄国来说,这次征服的影响是诱使她以巨大的代价,成为一个既是欧洲的又是太平洋的强国,并承受这样做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它使俄国自此以后陷身于满洲的纠纷和对日本的战争之中,因而对于俄国革命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关系。从较短期的角度来看,俄国吞并这一片地区标志着满洲遭到瓜分的第一阶段。所有这些已为人所周知,这里就无须着重地谈它了。

因此,本书的意图是:在有更多的档案公布于世,人们能够得以写出更翔实的信史之前,先行填补历史知识中的这一空档。

作者的目标在于提出一幅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清晰全景,而又尽可能不重复学者们已从用欧洲各种文字出版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片断资料。对于自1857年1月至1858年7月这一阶段,作者试图详尽论述迄今未被人所熟悉的普提雅廷出使中国的经过,以及中俄两方在阿穆尔河地区的相互关系和中国方面在北京制定对俄策略的过程,正如在中国档案中和巴拉第书信及回忆录中所反映的那样。同样的处理方式也应用于彼罗夫斯基出使中国的阶段,即约自1858年7月至1859年6月期间,虽然关于彼罗夫斯基活动的资料比普提雅廷的少。对于伊格纳提耶夫自1859年6月至1860年末出使中国,则只介绍了一个轮廓,仅对迄今尚未作过

xi 应有诠释的特殊事项详加叙述。这是因为:坂野正高已经依据中国档案,对于伊格纳提耶夫与中国人的一部分关系作了说明。伊格纳提耶夫本人在《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于1861年1月给外交部亚

洲司长关于他出使中国期间外交关系的总结报告》^①，与《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②中为自己的出使经过留下详尽的记述。关于这一时期，我提供了相当数量关于中俄双方在沿阿穆尔河和滨海地区相互关系的资料，这些，以前都还未从中文译出过。最后，我整整四年，即自1857年1月至1860年12月，试图从各有关档案把英、法、美三国对于俄国在远东活动所采取的政策，特别重点是英国的政策加以叙述。因为，这与俄国人之得以成功是大有关系的。

关于1792—1857年间俄中政治关系历史的连贯性记录从未公布。为使本书不致凭空立论，我在书的开头处为这些年月写了第一章，用以引出端绪。无庸讳言，这一章不过是个简略的提纲，所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和少量中国档案。可是希望它能有助于恰当地看到全书的主要部分。

至于1857—1960年间的资料，我有幸接触到大量的中文和俄文文件。中国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出版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③，几乎把1836到1874年间俄中之间来往的外交函件统统包括在内，那一期间有关俄国的谕旨与奏折，也差不多是全的。这是所有已出版的中国档案中最丰富与最翔实的一种，历史家们一致认为它极有价值。斯威舍在《中国办理美夷事务的经过》一书中把《筹办夷务始末》放在其他的书一起作了评价。他这本书内从《筹办夷务始末》中，译出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谈判期间有关俄、美两方的某些文件。收在《筹办夷务始末》中的很多关于俄国的资料从未自

① 本书以后各章均简称为《报告》。——译者

② 本书以后各章均简称为《材料》。——译者

③ 我没有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索引，而是按照全书的年代次序使用它的——因为必须同意吴相湘的意见，索引里面有目无注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即使是《筹办夷务始末》，似乎也没有把当时的有关文件全都包括进去。难以想象，那些有奏折收入此书的官员们彼此间从不互通私人信件。可惜这类私信从来未见发表过。

中文译出过,以致,许多研究俄国历史的学者也没有利用过。另一本中国档案《东华录》,载有《筹办夷务始末》中未载入的少数奏折与谕旨,这些也一直没翻译过。卷帙浩繁的《大清历朝实录》除了作为当代中国状况某些方面的背景材料外,别无用处。书内有关俄国的文件,《筹办夷务始末》内已经应有尽有,而且实录中的某些文件是经过节略或篡改的,把其中侮辱外国人的词句之类删去或改换了。

可惜,人物传记令人失望。他们不把跟俄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士的观点载入其内,这些人似乎谁也没有写过回忆录。我得以参考的唯一的一本,是追随过曾国藩级别较低的御史叫尹耕云的回忆录,看上去他没有跟俄国人直接接触过。第一章中我利用了《清代外交史料》,这部书令人失望,不如它的续篇《筹办夷务始末》那样材料丰富。当时中国期刊中可用的只有《京报》,它虽极为重要,里面可能保存许多早期的,但现已罕见的重要的谕旨,不幸我未能得到它作为参考材料。^①

我没有能够使用坂野正高所说现存台湾的中国档案。我自然也无法使用新近才移存英国伦敦档案局,但尚待分类的清代新资料。同一时期还有大量其他中文材料,从中也还可以找到与此接近的资料。但是我相信,凡是现时能够接触到的主要资料来源都已经查过了。

xiii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所有的档案,都是用官样文章的枯燥程式来表达的,翻译之后还需作一定程度的解释。如果照文艺复兴时代安科纳的学者奇里亚科的说法,史家的职责应该是“起死回生”,那末提出这些中文档案,至多不过只能把它们涉及到的死者的骷髅摆出来而已。所幸的是,还有其他的资料可以用来赋予这些骨

^① 本书正在付印,作者休假返回伦敦,此际,我查阅了《京报》,发现其中仅载有关于国内事务的谕旨。

架以血肉。

我未曾接触到俄国方面的档案。虽曾有过一次非官方的接洽,代我请求阅读档案的许可,但没有成功。后来我也再未提过此事。本书撰写到最后部分,临近付印的时候,我交上好运,得到一份用微型胶卷复制的伊格纳提耶夫呈交俄国外交部,并经官方印行的正式报告,其中所涉及的年月是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后半期,即1860年5月至12月。从这一来源得到的资料,随即以脚注形式大部分加进本书之内。《红档》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档案摘录。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传记里面,也包括很多有趣的文件。1878年度的《俄国档案》载有舒马贺尔的文章,其中收入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材料(这篇文章中没有列举文献,但是所提到的都可从其他来源得到很好的证实)。多亏苏维埃政府自五十年代中期推行的比较自由的政策,使我也能够在写作初期,从列宁图书馆借到本书论及到的事件的几个参与者所写,并已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书的印本即使有过,在西方也已多年无法得到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这个长篇记述曾在1892年匿名发表,但无疑是伊格纳提耶夫亲自写的,其中摘引许多重要信件乃至公文。书的有些地方编排得很乱,但总的来看不失为坦率的,因为有许多事已由其他材料充分证实。再者,这篇材料比伊格纳提耶夫的正式报告要好,它把伊格纳提耶夫出使的全部过程都包括在内了^①。可是,也有一些事情未在这本书中披露。布克斯盖夫登^{xiv}所著《俄国—中国》,第I卷,声称是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但是都未明列出处。书中有些似乎是真的,内容却未见于伊格纳提耶夫的材料或正式报告。而且,他的两本书中有的东西也被他删掉不少,某些地方肯定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它。巴

^① 《报告》和《材料》彼此在很大程度上互为补充,因为《报告》似少为人所闻,我就从《报告》中吸收了相当多量的材料。

拉第、涅维尔斯科依、司徒卢威、巴布科夫将军（此人在中亚细亚边境与中国接触）的回忆录都已承列宁图书馆借阅。所有这些材料都是1917年以前很久就出版的，它们就不象是曾经为了政治原因而篡改的。除布克斯盖夫登的著作之外，其他都可认为相当可靠。苏维埃时期在俄国出版的两本书，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这就是著名的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目》，和纳罗奇尼次基的《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中的资料目录。

最后，西方档案中颇有足以阐明谈判的资料。英、法、美三国在这些年月间派驻中国使节的外交文件，已由有关政府公布——或者象法国方面那样，由亨利·科尔迪埃在他所著关于1857—1858年和1859—1860年对华战役的两本书中加以引用。有不少从未发表的机密文件是在英国伦敦档案局、法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档案的微型胶卷拷贝中发现的。英、法、美三国驻圣彼得堡使节的报告同样也找来参考了。这些文件都证明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件也未曾刊印过^①。进一步的资料也是从微型胶卷拷贝中所得，有的是来自美国1856—1860年派驻阿穆尔地区商务代表所作，但从未公布的报告；有的来自1857—1860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未经发表的私人日记，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斯托克利文件。我也参阅了英国伦敦档案局所存的罗素手稿，和包德林图书馆所藏克拉伦登手稿，以深入了解那一时期英国上层的对俄政策，
xv 还参考了驻圣彼得堡、北京两地的英国使节与英国外交大臣之间的机密通讯。承蒙现在袭爵的马姆斯伯里伯爵慨允，我到他的庄园上查阅了第三代伯爵留下的文件，但从中找到的资料很少^②。法国外交大臣华留斯基的少量秘密信牍也在法国国家档案局见到了。

① 仅有克兰普顿爵士于1860年11月所作报告曾经付印，以供英国外交部使用。若干年前曾有一份付本赠给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② 我未能查阅额尔金伯爵的私人函件，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书里也引用一定数量英法方面与 1857—60 年对华战争有关的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其中都有关于俄国人在华活动的零星记载。这类西方提供的资料，虽然大部分早已公布，但是如果把它们和俄国和中国的资料系统地汇集在一起补充印证，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可惜有少数俄国的第二手著作我未能用上。最主要的就是卡巴诺夫论文的第二部分，与载于 1909 年度《军事文集》，卷 X—XII，季姆钦科-鲁班所写《俄国归并阿穆尔河沿岸、萨哈林和乌苏里地区》。后一著作卡巴诺夫在他的序言中认为是很宝贵的材料，并在他论文神秘的第二部分内加以引用。奥斯登-萨根于 1884 年发表在《圣彼得堡报》上的回忆普提雅廷之行一文，我只见到它的第一部分，而且是印在模糊不清的微型胶卷上的。

引言式的第一章所用资料包括中国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和内容不完备的《清代外交史料》，以及有限的英国外交部记录。关于这一题目的俄文第二手著作，有些现已找不到，涉及到这一题目的俄国档案则差不多没有。此外还有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中文资料散存世界各地的图书馆^①，不过鉴于它们的重要性较小，就决定不多花时间去查找了。

所以说资料是不完备的，但都可靠，并且足够为这一题目提供一个比迄今为止用任何一种文字写出的作品更为充实的记录。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不免随时失去价值，由在俄国或中国出版，根据俄国档案和后续公布的中国档案以及回忆录（它们肯定是存在的）中新的资料写出的著作所替代。有迹象表明，它对俄国或中国的出版者来说，未必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题目。中俄两国的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态度确实是整个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方面。因 xvi

① 见傅乐淑为迄至 1820 年时期所作的出色的书目提要。

此,在这里应该联带地谈谈。

显然,关于俄国占领阿穆尔河和滨海省的回忆,从来不是造成中俄关系和谐的因素,甚至苏联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对这件事的解释从来也不一致。熟悉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苏维埃政权以前,俄国人所持的态度,是从谴责到颂赞,形形色色,分歧很大。可是自从苏维埃独裁政权建立以来,就定下一种以成就自豪的爱国主义态度。而且就现在所知,斯大林当政之后,对此事的批评从未在官方出版的著作或小册子中出现过。有清楚迹象表明,自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就这个题目为公众写书是会给俄国人造成某种不安的。

首先,在苏联国内,自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起,很少出现过关于1917年前中俄政治关系的书。上述卡巴诺夫论文的第二部分甚至到了斯大林以后的政策转变时期,仍然不准向国外出借一事也肯定是有其意义的。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本书只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发行过为数不多的一版,而这本书在当时是足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的。库尔茨教授的书于1929年出版后,也未重印。尽管他这本书很值得发行第二版——不过,它是以强烈的俄国人观点写的,文中每每有明确地不同情中国之处。

在《远东国际关系》一书中简短地提到归并阿穆尔,给人以辩解的感觉,并且把责任放在中国方面: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英、法正在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并准备发动一次反革命的干预以镇压太平军。中国政府力求利用英俄间的矛盾。当时,它特别需要调整跟俄国的争论,同时也认为作出让步是得策的。1858年的璦琿条约中,中国明确地承认了阿穆尔地区归属俄国,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承认乌苏里地区归属俄国。穆拉维约夫认为尽快地解决此一问题极关重要,他害怕英国占领波谢特湾。

这些地方与俄国的结合，为俄国构成保卫它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领土的必要战略基地。

必须认识到，俄国在远东和中央亚细亚扩展领土一事发生时并未损及中国人所定居的土地。事实上这些地方都不是与中国相连的。沙皇俄国尽管具有反动和侵略的性质，但是并未对中国作战，而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了与中国的分歧。俄国也没有积极参与对太平军叛乱的镇压。

1957年出版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中谈到的政治史如此之少，以致使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解释不免为之减色。可是，他以三页多篇幅谈了1857—60年的远东事态。在里面他似乎是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中俄关系在这些年代中一切都是协调的。在第105页上，他以如下的话来介绍这个题目。“彼时，俄中关系中出现保卫他们的领土不受外国侵袭的公共利益……俄国于1858—60年在欧洲人的对华战争中出头干涉，和她在议和谈判中的斡旋，赋予俄国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高度威信”。斯拉德科夫斯基叙述了《璦琿条约》的各条款，却没有提示中国人并不乐于签订这个条约，而且还曾予以否认。在第107页，他认为中国皇帝初时之所以不愿意批准俄国的《天津条约》，是因为英、法两国的《天津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使他烦恼。斯拉德科夫斯基承认俄国所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与其他列强所订条约一样，是“不平等”的。然而他又说由于俄国未能利用从这些条约中获得的特权减弱了这种不平等。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论调不仅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提出的互不一致，而且他们不都是属实的。本书下面还要提到这点。 xviii

纳罗奇尼次基于1956年出版的巨著：《资本主义列强1860—1895年在远东的殖民政策》，显然意在为比阅读前二书的人们更专的那一部分公众写的，它也较另两书为公正。由于此书自1860

年写起,就对阿穆尔这段插曲的始末未作详细叙述,只在开宗明义的章节里,用学者风度和诚实的笔法扼要地一提,但是书中也有些大的纰漏,而且大部分材料业经公布,多数依据的是西方资料。书内未用多少俄国档案,中国档案连一件也没有用。可是纳罗奇尼次基却在书末列了一张非常引人注意的书目,其中显然包罗了俄国档案内关于 1840—1895 年时期俄国远东政策的一切资料。此事似可以表示俄国学者并没受阻拦,不让去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即使出版得是极少的^①,纳罗奇尼次基也为 1861—1895 年间的俄中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概述,并使用了一定数量的俄国档案。但是在象他所写的那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中,既然把一切欧洲国家相互关系,又把中国和日本相互关系都包括进去,他自然就无法详尽而深入地谈俄国方面的事情,书中这一部分遂不免为英、法两国远为多样化的活动所掩盖。

中国史学家方面确实有过许多表示,指责俄国在 1917 年以前对待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吞并阿穆尔河土地一事。迄今用中文所写研究近代中国和她的对外关系的历史,把阿穆尔问题的前前后后包括在内的书已达几十本之多。就作者所曾经查阅过的二十来本书而论,没有一本对于这一片土地的丧失认可。虽然有些历史学家,例如著《近代中国史》的郭廷以,和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的陈复光所作的议论是有节制的,但是很多人用毫不含糊的字句抨击了俄国人。

曾友豪在 1926 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史》中谈到《北京条约》时

① 从俄国刊物上看不出有任何俄中关系历史的书预定要出版,虽然科学院的七年计划要出版一本文化关系史(见《历史问题》1960 年 12 月第 113 页及其后各页。同时也有个研究中国人移民到阿穆尔省的计划,见《东方学问题》1959 年第 5 期)。《历史研究》上也没有提到有研究俄中关系的任何计划。可是,只有在最近看来才有苏联的历史学家,对清史本身开始真正感到兴趣。见 1965 年 9 月《历史问题》齐赫文斯基的文章。

说：俄人不费丝毫气力，居然诱得中国承认给予乌苏里以东九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其侵略手段诚足令人惊叹。

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含蓄地表示他并非不同意把阿穆尔河北岸割让俄国。在这一方面，他在中国的评论家中可以说是异常宽恕的。可是就连他也把北京条约概括为“在俄国得之为殊利，在我国失之为创闻”。^①

陈博文在他 1929 年所著《中俄外交史》中写道：“俄人不费一弹，不损一兵，徒凭威吓伎俩，于二、三年内攫取我国如许领土，木喇福岳福^②之侵略东方，至此可谓大告成功。而满洲朝鲜一带，乃从此多事矣。”

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中所说是他所有的评论中最为激烈的。他把书内关于阿穆尔河事件的一段冠以“俄国友谊之代价”的篇名，把奕山有关《瑷珲条约》的奏折描绘为“中国外交史上最可耻可羞的文案”，把穆拉维约夫之对待奕山，说成“象十九世纪初年英法德野心家对付非洲土酋的方法”。后来他断言“俄国开口就讲……英国如何强暴，讲中俄应如何联合以抗英，从那时到现在，俄国对中国外交没有变过”，蒋廷黻在最后讲俄国取得阿穆尔河地区的利害轻重“不言可知”。

上海 1939 年版李鼎声所著的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史》的态度是冷静的，但是篇末为学生所列习题当中，有一条关于 1856—60 年事件的提问却露出作者的心意。这条提问是：“俄国由英、法联军之役在中国获得了什么利益？”

① 肖一山在他所著《清代通史》中凡有关中俄关系的章节，均表示了他不同意将黑龙江左岸割让俄国，应当认为措词是明确的。作者此论显系错误的了解了肖的原意；又原著此句为“a very great gain for Russia and injury to China”，按“injury”一字意为创伤，而肖原文为创闻，亦系作者误解。——译者

② 即穆拉维约夫。——译者